

唐宋八大家名篇赏析与译注

苏轼卷

主编 王彬 副主编 崔国政



经济日报出版社



* T188670 *

苏

轼

卷



唐宋八大家名篇赏析与译注

徐秀珊 注释
康锦屏 评译

经济日报出版社

AB227/0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宋八大家名篇赏析与译注: 苏轼卷/徐秀珊注释; 康锦屏评译.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6. 12

ISBN 7-80127-248-X

I. 唐… II. ①徐… ②康… III. ①古典散文-中国-唐代选集②古典散文-中国-两宋时代-选集③苏轼-古典散文-选集
IV. 12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9549 号

唐宋八大家名篇赏析与译注——苏轼卷

注 释:	徐秀珊
评 译:	康锦屏
责任编辑:	初志英
责任校对:	李为先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 277 号 (邮编 100746)
总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永清县第一胶印厂
规 格: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7.75 印张
字 数:	185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27-247-1/I·6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12.5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出版说明

中国古代的散文，如果从大的角度分解，只有古文和骈文两种。

所谓古文是指先秦两汉以及对其模仿的文章。所谓骈文便是骈体文，自魏晋至唐代流行于文坛，乃至影响公事文件。因为流行于时，故称今文。古文便是相对于今文的对应名称。作为骈文，在古文家看来，有两个弊病。一个是过于注重形式，注重声律与对仗，不能自由地抒发思想；再一个是脱离了道统。故而要以古文来校正。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两次古文运动，一次是唐，一次是宋。唐的古文运动是校正骈文；宋的新古文运动是校正骈文的余波，从而使古文成为中国文坛的主流，直至封建社会解体。

无论是唐还是宋的古文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或者说特色也未尝不可。一是推崇先秦两汉的文章，提倡一种自然流畅的散体文字。再是强调道统，文以载道。这对于骈文而言，或许是一个进步，但提倡先秦两汉的文风和道统，无论在语言还是思想上都必然落后于时代的进展，故而到了“五四”，便自然消解了。当然，这是后话。从历史的角度看，唐与宋的古文运动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成为先秦两汉以后的又一个散文高峰，当时的许多作品至今仍为有志于文的人们视若拱璧。

作为这两次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在唐有韩愈，柳宗元。在

宋有欧阳修、王安石、苏洵、曾巩、苏轼与苏辙。后人简称为“唐宋八大家”。这称号始见于明中叶茅坤所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而究其渊源则更早一些。明初的朱右曾便编过一本《八先生文集》，把韩、柳、欧、王、曾、三苏的文章汇集在内。自此，以唐宋八大家合集的读本，便盛行海内，绵延不绝而为人所乐道。

基于此，我们选编了这套《唐宋八大家名篇赏析与译注》。目的只有一个，依然是为有志于文者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读本，但愿大家喜欢。

王 彬

1997 年 1 月 1 日

苏轼小传

徐秀珊

苏轼(1036—1101)，北宋著名文学家。字子瞻，一字和仲，自号东坡，四川眉山人。

苏轼出身的家庭文化氛围浓厚。其父苏洵，其母程氏都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幼承家教，为他日后步入仕途与文学创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嘉祐元年(1056)三月，苏洵带着苏轼与苏辙赴京应举。次年，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四月，因母丧回蜀。嘉祐四年(1059)，服丧期满，苏轼又同父亲、弟弟赴京。不久，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今河南伊阳西)主簿。主簿是佐领知县典领文书的九品文官。但苏轼并未赴任，后经欧阳修推荐，参加了秘阁的制科考试，与苏辙同“入三等”，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以京官的身份充任州府签判，职位显著提高了。

到了英宗治平二年(1065)正月，苏轼任满还朝。次年苏洵病故，于是苏轼又回到四川居丧，直到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丧满才返回京师。这时，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因政见不合，苏轼请求外调。四年(1071)，苏轼被派到杭州任通判。此后，直到元丰二年(1079)苏轼又先后在密州、徐州、湖州做地方官。苏轼为官清廉，在密州做知州时，因官俸减少，

他与通守刘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因为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过《杞菊赋》，苏轼也效法他，同样写一篇，名之《后杞菊赋》。苏轼对百姓是爱惜的，熙宁十年（1077）他调任徐州，那一年黄河决口，苏轼“庐于城上”，亲率军民防洪，徐州得以保全。不久，苏轼又调到湖州，厄运也就来了。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湖州谢上表》和几首诗，被变法派中的新进官僚指摘出来，认为讥讽新政，将他逮入京师，关押在御史台。后经多方营救，方被释放，被谪贬到黄州，责受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判。在黄州期间，苏轼以待罪之身，处于矛盾心态，他想补于国事，却只能处于闲人的位置，迫使他将其精力集中于文学创作。这期间，他写下了前后《赤壁赋》和许多著名的诗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

但神宗没有忘掉苏轼，多次想起用他。元丰七年（1084）神宗下诏移苏轼为汝州团练副使。次年知登州。这一年三月，神宗病故，哲宗嗣位，高太后听政，起用司马光执政。元祐元年（1086）苏轼回到京师。先是做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为中书舍人，不久又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在仕途上，苏轼应该说是苦尽甜来了，但苏轼并不求自保，而是有话直说。对于司马光尽废新法，苏轼不尽赞同，于是又受到攻击，而请求外调。元祐四年（1089），苏轼复知杭州。六年（1091）三月被诏还京。八月出知颍州。次年二月改知扬州。八年（1093）出知定州。在杭州，苏轼减赋赈荒，掘湖修堤。在定州，苏轼整饬军纪，加强边备，受到百姓的爱戴。

到绍圣元年（1094），高太后死后，哲宗亲政，苏轼的厄运又来了。由于新党得势，贬斥元祐旧臣，苏轼又成为打击对象，而一贬再贬。先是贬到英州（今广东英德），未至贬所，又贬到惠州（今广东惠阳），再又贬到儋州（今海南儋县）。贬官期间，

苏轼的生活十分艰苦，尤其是在儋州，地势卑下，气候蒸郁，但苏轼却“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写了不少名作。仅就散文方面说，在风格上，他这时的题材更加生活化、日常化，为中国古代散文注入了新的创作活力。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继位，向太后听政。五月大赦，苏轼被移置廉州（今广西合浦）。九月改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行至英州，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年底，越南岭北归。次年，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苏轼到达虔州（今江西赣州市），五月到达仪真（今江苏仪征），六月到常州居住。本来，苏轼自元符三年冬朝廷准许他在外州任便居住后，友人建议他卜居舒州，苏轼也有此意，但苏辙则苦劝他回到颍昌（今河南许昌市东），苏辙全家都住在那里，苏轼同意了。但行至仪真，听说朝内曾布诸人又构陷元祐旧臣，苏轼不寒而栗，惧怕居住在京师附近更容易受到陷害，于是决意在常州定居，不久便卒于常州。次年六月，葬于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郟城钓台乡上瑞里。

苏轼在北归途中，游览金山寺时，写过一首《自题金山画像》的六言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末句是苏轼一生被贬的三个地方。前一句，“问汝平生功业”则充满辛酸反讽，这对于苏轼的志向——治国兴邦来说，是沉痛的，但是，对于他在文学事业上的成就，却又充满自豪。而且也就是由于生平多贬，而使他在文学创作中寄寓了复杂深沉的人生感慨。苏辙说过，在苏轼贬谪黄州之前，他们兄弟二人在文章上还可以相颉颃，“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也。”（《东坡先生墓志铭》）对于苏轼而言，或者又是幸运的了。这当然只是一方面因素，而他的文学成就，无论是在诗、词、散

文，以及文学理论，苏轼都达到了他那一时的最高造诣，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重要遗产。

元符三年（1100）五月，苏轼在结束南迁，离开广州北上的时候，给谢民师的一封信中说：“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以行云流水推许谢民师的文章。其实，这也是他的自许。他在《自评文》中便说过“吾文如万斛泉涌”，“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简单地说，苏轼的散文有两个最显著的特色。一个是议论，政论文是不用说的，即便是在记叙抒情乃至小品文中也依然时时可以看到舌辩滔滔的痕迹。另一个是散文的生活化。于习见的琐细之处开掘新的境界，将生活转化为艺术。这一特点——化纤芥涓滴为意趣无穷的艺术功力，在他贬居黄州尤其是岭海以后的随笔与书简中最为显著，往往是自然说出，“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从而赢得了极多的读者。故此，在苏轼的身前，有关他文章的各种辑本便十分流行。明以后又有多种全集本问世。流传较广的有茅维编的《苏文忠公全集》，程宗的《苏文忠公全集》，蔡士英的《东坡全集》。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孔凡礼校订的《苏轼文集》，是目前坊间的流行本，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便是从此选出的。另一部分选自1981年王松龄点校的《东坡志林》，并参酌他本校订。为简篇幅，不一一注出了。总之，对于苏轼的散文进行选注，于我还是第一次，错误和缺点是可以想象的。过去有一种说法，“韩潮苏海”，苏文如海，而我们这里不过是掬取了小小的一勺，这就免不了陷于以蠡测海的困境而需要得到指教的。

目 录

苏轼小传	徐秀珊 (1)
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	(1)
南行前集叙.....	(6)
上梅直讲书.....	(9)
留侯论	(14)
韩非论	(20)
策别课百官三	(25)
策别安万民五	(34)
喜雨亭记	(41)
凌虚台记	(46)
书戴嵩画牛	(50)
祭欧阳文忠公文	(52)
后杞菊赋并叙	(56)
超然台记	(60)
李氏山房藏书记	(65)
李太白碑阴记	(70)
日喻	(73)
放鹤亭记	(77)
湖州谢上表	(82)

文与可画筼筻谷偃竹记	(86)
到黄州谢表	(92)
答秦太虚	(97)
与言上人	(104)
与王元直	(107)
方山子传	(110)
记游松江	(115)
游沙湖	(118)
赤壁赋	(121)
后赤壁赋	(128)
记承天夜游	(133)
记游定惠院	(135)
书雪	(138)
别石塔	(140)
石钟山记	(142)
记游庐山	(147)
蓬莱阁记所见	(150)
答毛泽民	(152)
六一居士集叙	(155)
六一泉铭并叙	(162)
潮州韩文公庙碑	(166)
游白水书付过	(176)
记游松风亭	(179)
题合江楼	(181)
黠鼠赋	(183)
试笔自书	(186)
书海南风土	(189)

儋耳夜书·····	(192)
记岭南竹·····	(194)
书谤·····	(196)
与王庠·····	(199)
与元老侄孙·····	(202)
醉乡记·····	(205)
东坡酒经·····	(209)
石菖蒲赞并叙·····	(212)
名容安亭·····	(216)
记鬼·····	(218)
石崇家婢·····	(220)
书子美黄四娘诗·····	(222)
自评文·····	(224)
书合浦舟行·····	(226)
与谢民师推官书·····	(228)
书舟中作字·····	(234)

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①

[原文]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②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③，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咻^④之声，欢休^⑤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⑥。成、康既没，穆王^⑦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⑧。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⑨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⑩，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⑪，尧曰“不可，鲧方命圯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⑫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

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⑬。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⑭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⑮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注释]

①此文选自《苏轼文集》卷二论。嘉祐二年（1057）苏轼应礼部试，做此文。主考官欧阳修十分赏识，写信给梅圣俞：“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②尧、舜、禹：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儒家尊为明主。文、武、成、康：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周朝的明君。

③怜惜惩戒。

④吁：反对之声。俞：赞许、应允之声。

⑤休：欢乐。

⑥指《尚书》，我国重要文化典籍，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

⑦周穆王。

⑧吕侯：即甫侯。周穆王时任司寇。祥刑：善于用刑。祥：善。

⑨《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孔安国传云：“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苏轼此处引文与此不同，但意相同。大意是：罚有疑从轻，赏有疑从重，以示忠厚。

⑩皋陶(yáo)，舜时的掌管刑法之官。苏轼误为尧时人。“杀之三”、“宥之三”，此处为苏轼虚构。欧阳修曾问之，苏轼回答说：“何须出处。”

⑪四方诸侯之长。鲧(gǔn)：禹的父亲。被四岳推举治水，失败被杀。

⑫参见⑨

⑬残忍之人。

⑭语出《诗·小雅·巧言》。苏轼引文次序颠倒。意谓如果君子喜纳贤人之言，恶谗人之言，则乱事自然不会发生。祉：喜欢。沮：终止。

⑮孔子著。

[译文]

在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代，君主爱护百姓、关心他们的疾苦是多么深切啊！完全用君子、贤德的人的为人处事准则对待天下的百姓。谁做了一件好事，就立即奖赏他，又及时歌颂他，赞美他，以此表示对他有了良好的开端的喜悦，并勉励他坚持到底。谁做了一件坏事，就立即处罚他，随后又怜悯他，惩处他，以此帮助他弃旧图新。所以那些圣君们的叹息、欢乐、悲伤的情绪，都从虞、夏、商、周时代的典籍中一一表现出来。周成王、周康王

逝世以后，周穆王即位，周朝的政治局势已开始衰落，但是还命令他的大臣吕侯制定法规，并告诫他要善于用刑。穆王的话充满忧虑但不悲伤，充满威严但没有怒气，对犯罪的人既慈爱又果断地加以处罚，对无罪的人则抱有同情怜惜的心情，所以孔子还是把他的话说进《尚书·吕刑》之中。孔安国给《尚书·大禹谟》的传文说：“在决定赏赐的时候有了疑问，应当采取给予的态度，这是用来扩大恩赐范围的做法；在决定处罚的时候有了疑问，应当采用免于处罚的态度，这是用来表示谨慎用刑的做法。”在唐尧时期，皋陶担任掌管刑法的职务，在准备处死人的时候，皋陶多次说“杀了他”，可是唐尧却多次说“饶恕他”，所以天下的人害怕皋陶执法的坚决，而喜悦唐尧用刑的宽大。四方诸侯的首领说“鲧可以任用”，唐尧先是说“不能任用，鲧一旦违抗命令就会毁了同族的人”，不久又说“让他试试看”。为什么唐尧不听从皋陶杀人的意见，却同意四方诸侯的首领任用鲧的建议呢？既然这样，那么圣人的用意，大概也能够明白了。

《尚书·大禹谟》写道：“在给人定罪的时候产生了疑问，应当从轻；在给人记功的时候产生了疑问，应当从重。与其错杀无罪的人，宁可违背用刑的常规。”唉，这已经把“刑赏忠厚之至”的含义说尽了！可以赏赐，也可以不赏赐，如果赏赐了就会超出仁慈的界限；可以处罚，也可以不处罚，如果处罚了就会超过道义的标准。赏赐超出仁慈的界限，还算得上是一个君子；处罚超过道义的标准，就会成为一个残忍的人。所以仁慈的界限可以超出，而道义的标准却是不能超过的啊。古时候不拿爵位俸禄来赏赐，不用刀锯作为刑具。拿爵位俸禄作为赏赐，这种赏赐的方法，只能在得到爵位俸禄的人中推行，而不能在没有得到爵位俸禄的人中推行。用刀锯作为刑具，这种刑具的